

欽縣文史資料

第三輯

89



三

目 录

先父徐谦在“三·一八”前后	徐英	(1)
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几处同	徐英	(4)
读徐谦殿试对策卷	鲍弘道	(7)
附：徐谦殿试对策卷		(10)
清明节后叙乡情——回忆徐谦，兼忆徐鼐	鲍弘道	(14)
抗战初期歙县党组织的恢复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活动的开展		
吴立奇	(18)	
我所经历的“五四”革命运动		
严坚吾口述，少求整理	(23)	
歙县人民支援“五卅”运动	方浩然	(30)
王任之与歙县民盟	沐鸿	(34)
忆我的老师吴承仕同志	史立德	(36)
人民音乐家张曙生平事略	汪继长	(54)
方与严同志轶事	学文、乃桐、益新	(61)
围棋元老过惕生	苏杰	(74)
美籍华裔科学家张逢铿博士	张逢沛	(83)
为祖国交通事业奋斗终生的工程师汪道源	苏杰	(88)
回忆程啸天兼评他的山水画	鲍杰	(98)
戴锦荪生平事略	李新宽	(109)

- 黄节与黄镇 仇乃桐 (122)
- 勤栽桃李语音精
——回忆汪时叙同志对“双推”工作的贡献 井然 (125)
- “徽戏”在徽州 陈长文、严济棠、李太 (131)
- 徽墨浅谈 姜林和 (147)
- 徽商与百年老店——祝裕隆 宁文广整理 (154)
- 歙县的名医世家 洪芳度 (160)
- 歙县蜀口曹氏外科简介 曹恩溥 (165)
- 歙县大刀会始末记 胡学文整理 (170)

先父徐谦在“三·一八”前后

徐 英

每当提起1926年的“三·一八”运动，就不禁唤起我对先父徐谦的深深怀念。

父亲徐谦是清朝末年进士，后授翰林院编修。与那些顽固的封建士大夫不同的是，父亲是一位具有新思想的人，在京供职期间，他与一些进步人士过从甚密，经常在家中议论时政，当时我年纪尚小，父亲这方面的话当然就不会对我讲，但有时也听到他一两句诸如此类的话：“清朝太腐败，实在应该推翻。”民国建立后，父亲联合一些人组织了国民促进会，拥护孙中山先生建立共和制度的主张。不久，袁世凯接替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在组建内阁时，因父亲精通法律，被任命为司法次长。“二次革命”后不久，袁氏企图帝制自为，为拉拢父亲，曾许以司法总长一职，父亲对袁氏的倒行逆施气愤之极，毅然弃官南下，只身来到上海。在寓居上海的几年间，他创办了中国法政大学，史良就是这所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生。其后，父亲又去广州，投身孙中山先生麾下，参与广东革命大本营的工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1925年初，由于北方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父亲受孙中山先生的委派，回到北京主持国民党北京政治分会的工作。那时，我正在燕京大学一年级读书，回到家里经常和他在一起。父亲这时已不再把我当小孩子看待了，他常常教导我：“青年人不光要刻苦读书，还应该以救国

救民为己任。”在父亲的教诲下，我开始参加一些青年学生的爱国活动。这一年，上海发生了英租界巡捕抢杀中国示威群众的“五卅”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北京的爱国学生立即组织了“五卅”后援会，支援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我是该会的财务主任，掌管募捐来的钱款。记得那次一共募得三万多元，我平生第一次管这么一大笔钱，很担心出事，父亲见状，便请当时的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派来一个排的士兵看守了一夜。翌日，我就和几个同学携带这笔捐款前往上海发放去了。

从上海回来后，后援会又酝酿创办一所“五卅”学校，建校的资金由我和梁士贻的女公子负责筹集。这次是在上层人士中募捐，联系的对象都是父辈，我们也就倚小卖小，很不客气。我俩先找了李烈钧先生，说明来意后，他很爽快，说办这样的学校是好事，理应支持，说罢就拿给我们四百元。从李宅出来，我们又去见国务总理王宠惠。起初，他只准备拿出一百元钱，我说：“这太少了，您至少要和李老伯一样多。”他叫起苦来，说自己是穷总理，没有钱，我们就是不让步，最后，他只好也拿出了四百元。接着，我们又请另外几位上层人士捐款，父亲也捐赠了几百元，这样，很快便筹集了三千元。办学的资金有了，但是没有校舍，于是又靠父亲出面与鹿钟麟协商，借下了某王府的一所宅第。父亲此次为开办“五卅”学校，出力很大，决不只因为我是他的女儿，他作为北方国民革命的主要领导人，对民众的爱国行动一直是不遗余力地支持的。

第二年3月中旬，日军炮击冯玉祥驻大沽口的国民军，并提出八项最后通牒。当时，我们很多学生对事件的政治内容并不太了解，只是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气势，感到自

己身为中国人，决不能让国家遭受如此的屈辱。大家就是抱着这样一种心情，参加了3月18日在天安门前举行的国民大会，声讨日本的侵略行径。父亲是国民大会主席团主席，他主持大会并发了言。大会结束后，我参加了去段祺瑞执政府请愿的示威游行队伍，万万没想到，段祺瑞竟向卫队下令，枪杀手无寸铁的请愿学生。当枪声响过后，人群大乱，我随着几个同学向院内南侧的马厩跑去，突然，迎面冲来几名士兵，向我们开枪射击，我应声倒在地上，稍顷，才又爬起来继续向西门跑去，这时，我浑身溅满了血，在我面前是横七竖八地倒在血泊中的死伤者，那种场面真是惨不忍睹！最后我被一位男同学连拖带掀，抛出了大门，这才得以逃生。

脱险以后，我挂念着父亲的安危，便连忙给他在苏联大使馆的住处打电话。家人在电话中告诉我，父亲在大会上讲话时因激动过度，致使痔疮大出血，已被抬了回来。我赶到苏联大使馆时，见父亲躺在床上，他已知道执政府院内发生的事情，气愤得不能自制，病势更严重了，丁惟汾等人正在一旁劝慰他。 —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父亲和共产党人李大钊先生遭到通缉，处境十分危险，但他们仍然坚持工作，直至处理完善后的事情才离开北京。随后，父亲便和冯玉祥将军同去苏联考察，待到奉系军队进驻北京，发现我父亲已经出走，他们便要来抓我，多亏燕大校长司徒雷登先生通风报信，我才及时逃出北京。直到1927年5月，父亲从苏联回国后在武汉国民政府任职时，我才从美国回来与父亲团聚。

（转载自1987年3月21日《团结报》第808号）

共看明月应垂泪

一夜乡心几处同

徐 荟

去年中秋节，我是在合肥过的，应邀出席了有安徽省各界人士和归侨、台属200多人参加的中秋茶话会。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过这样盛大、热闹的中秋节！我不仅观看了精彩的文艺演出，还听到了热情沸沸的乡音，我激动得不能自己，“月是故乡明”呀！

我是一个飘泊在海外的人。六十二年前的1926年，日本炮击大沽口，并提出损害我国主权的无理要求。我那时是燕京大学学生会的代表。3月18日，我们青年学生游行示威，向临时执政的段祺瑞请愿，要求强硬驳复日方的最后通牒。凶恶的反动政府竟血腥地加以镇压，一时枪声四起，同学们一个个倒在血泊中，……我满身是血。这场死伤200多人的屠杀，便是历史上的“三·一八”惨案。我父亲徐谦和李大钊等人，是这次爱国运动的领导人，当天就遭到段祺瑞的通缉。我父亲便和冯玉祥将军去苏联考察。

张作霖率奉军进关，占据北平，白色恐怖笼罩着这座古城。一天，司徒雷登校长使人通知我，要我立即离开学校，说张作霖要逮捕我。我便躲进东交民巷苏联使馆内我父亲的办公处。我父亲是中俄大学校长（后来改名政法大学），并负责管理俄国的庚款。燕京大学的教授，通过电话给我授

课。我学完了这个学期的课程后，苏联公使加拉罕派人护送我，秘密从水门上了去天津的火车，避开了军警的检查。又从天津乘船去上海，逃亡美国，继续上学。

我长期生活在美国，虽然美国有较高的物质文明，但没有使我忘怀生我育我的祖国，我时刻都想着为祖国做贡献。我长时间被选为燕京校友会会长，至今仍是美国燕京校友会15个理事之一。1958年，燕大校友演出京剧《霸王别姬》，募捐司徒雷登奖学金。那时，中美还没有建交，演戏的行头，我托台湾的亲友做来。戏演得很成功，在亨特大学的2000座位的大礼堂演出，观众中就有台湾的俞大维先生。他看后称赞说，在台湾也没有办法演出这样大型的梅（兰芳）派戏！第二年，我们原班人马很荣幸地得以在纽约较大的演出场——利斯诺厅公演，仅这场戏就捐到4000美元。我曾两次到香港、台湾为杰出的中国学生发放奖学金。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我于1959年成立中国海外音艺中心，向海外宣传中华的优秀文化。我组织会京戏和歌舞的胡氏三兄妹，在美国各州轮回表演几年。1962年，纽约举行世界博览会，各国都有演出队，唯独没有中国的，我便率领胡氏兄妹参加，演出半年，每天日夜四场，还三次应邀到电视台演出。十年内观众达110万人。

1972年退休以后，我迁居夏威夷，仍通过中国海外音艺中心继续向海外介绍中国文化。中国《诗经》中讲到的好些植物，在美国也能找到，我便组织展览会，通过展出这些植物，介绍了中国古老的《诗经》，得到了好评。

中美建交后，从1978年起，我先后回国八次，和文艺界联络，组织一些人到夏威夷演出。虽然今天我年事已高，仍希望继续向海外宣扬我中华文化。

1964年，我在报上读到扬州市高副市长的文章，他计划把扬州建成世界观光的旅游胜地，我便去信，说我出生在扬州外祖父的于家花园，询问这个花园是否还在？一个月，两个月……杳如黄鹤。我心想，副市长政务在身，工作忙碌，是没法顾及这件小事的了。不料半年后，我收到了有关于家花园的回信。我多么想看一看我这个出生地呀！其后，我又看到朱江写的《扬州园林品赏录》这本书，便去信询问于家花园叫什么名字，我这才得知叫“养心园”，几度战火的洗劫，花园已不复存在。

1986年，我发起举行“三·一八”惨案60周年纪念会，得到了政府的赞同和支持，并蒙邀请我回国参加。会后，我去扬州探访我的出生地于家花园。我十分感谢当地政府在故址为我的外祖父母建立了衣冠冢。

我三岁丧母，听老人说母亲葬于北平三圣庵，我去信查找，不久前方得知三圣庵在今北京南海淀，我萌生了要把母亲的墓迁葬回祖籍安徽歙县徐村祖茔的想法。我这一孝思又蒙安徽当局的慨允，并得到大力的帮助。1987年10月2日，我终于在一个背山面水，风景优美的山坡上安葬了母亲的泥灰和照片，并立了墓碑，以慰母亲的亡灵。

我在海外度过了几十个春秋，虽然美国不兴中秋这个节日，但是每当中秋之夜，我看到高悬天际清澈明澄的明月，就燃起怀念故乡的一片炽烈感情，我们在海外的炎黄子孙，都是有“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几处同”的感觉的。

（转载自《安徽画报》1988年第一期，个别地方有删节）

读徐谦殿试对策卷

鲍弘道

读完了歙县徐村人徐谦应殿试时的对策，深深感到，在旧时代，一位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能够写出这篇思想相当进步的文章，确实难能可贵。

清末采用维新运动者的主张，废八股，改用策论作为科举考试的一个项目。徐谦于光绪二十九年（公历一九〇三年）参加殿试时写的这篇文章，对光绪帝所问设官、明刑、理财、交涉（指外交）等四个方面的问题，一一作了回答。

这篇文章一开始就提出全文的中心论点：“去成见”，“正人心”。他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情况都在不断改变。“世无不变之法，法无无弊之时”。要顺应时势的变异，把国家治理好，就必须消除成见，端正人心。这样，才能做好设官、明刑、理财、交涉等方面的工作。接着，文章就对这四个方面分别进行论述：

在设官方面，希望清廷整顿吏治，要求官吏人人称职，裁减闲散无用的官员，增设必要的官职，用人必须循名责实。

在明刑方面，建议清廷考查古代法制，设置法律学，命令群臣学通中西法律。

在理财方面，希望清廷体恤人民，要让人民富裕起来，而后国家才能财源不竭；还要设置商务官，订立商约，使外商不能专利于中国。

在交涉（外交）方面，要做的事很多，如设立商部和广

设商务学堂等等（当时与外国交涉，常常涉及通商事务），但最重要的是“必以强权为首务”。因为当时“公法主乎强权”，如两国强弱不敌，强国即将侵略弱国，而不讲什么公法了，所以办外交必须有强大的国力做后盾。

在进行以上四个方面的论述后，徐谦再一次提出“去成见”，“正人心”，以总结上文；并着重指出：要做到这两点，就必须发展教育事业，多办学校，培养人才。有了大批人才，各项工作才能做好。

从徐谦殿试对策卷看来，他的一些观点，在当时的确是相当进步的。青年时期的徐谦，在对策中显露出过人的才识。他怀着振兴国家民族的殷切愿望，对内政、外交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意见，颇能切中时弊。他指出消除成见、端正人心是搞好各项工作的先决条件，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是治国兴邦的根本大计。这些观点至今仍值得人们赞赏。当然，徐谦当时的思想仍有时代的局限性，还不可能超越改良主义的范畴。我们决不可牵强附会，把他说的某些话同我们今天提倡的“解放思想”、“改革体制”、“建设精神文明”等等混为一谈。但在一九〇三年，在距今八十五年前，亦即“十月革命”发生前十四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十八年，那时旧中国的一位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能够有那样的思想观点，难道说还不难能可贵吗？

徐谦殿试卷是一份珍贵的文史资料，它有助于我们研究徐谦早年的思想。另外，它还为我们解决了一个问题：徐谦出生于哪一年？

过去我们都曾说，徐谦出生于一八七一年（见《中国美术家人名词典》），现在读了这份试卷，才知并非如此。试卷开头写明：“应殿试举人臣徐谦年贰拾捌岁安徽徽州府歙县

人由副贡生应光绪貳拾捌年乡试中式由举人应光緒貳拾玖年会试中式今应殿试……”徐谦于光緒二十九年（即公历一九〇三年）参加会试，同年参加殿试（向例农历三月会试，同年四月殿试。光緒二十九年三月改在河南开封会试，殿试仍在北京举行，但试期延迟至同年五月）。依照我国过去的习惯，都是以虚龄计龄。试卷载明，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他参加殿试时，年二十八岁，由此可以推知他是一八七六年出生的。

小 重 山

洪汝闇

有约行云到画廊，簾钩鸚鵡喚，夜惊霜。依前明月照匡床。经年恨，各自耐思量。

憔悴舞罗裳，为君赓楚曲，不成商。天寒催迭缕金箱。花枝折，肠断杜秋娘。

（编者注：洪汝闇，字泽臣，又作泽丞，歙县岩寺人，本辑刊载了他的词五首，皆录自中华书局出版的《全清词抄》第四十卷。）

徐谦殿试对策卷

编者按：徐谦殿试对策卷，是已故欽籍国民党元老徐谦先生于清末参加殿试时所写的一篇文章，原件由其女徐英女士珍藏，本刊转载于此，以飨读者。付印前，我们请鲍弘道同志给徐文加上标点，划分段落；还请他写了《读徐谦殿试对策卷》一文，评介了徐文的思想内容。关于徐谦的生平事迹，请读者参阅本刊第二辑内《国民党元老徐谦》一文。

臣对：臣闻天开一代之变，所以成一代之治，是诚千载一时之会也。时未至，圣人不能违天；时既来，天不能违圣人。所以转移世运，固结人民，弭内忧于无形，御外侮于方炽，要在沉几观变而已。图治之方，惟去成见；教弊之道，在正人心：此应变制治之本也。世无不变之法，法无无弊之时。古今东西，其理一致。成见不去，则无变非偏；人心不正，则无法非异。是故职官之宜繁简，刑律之宜疏密，货财之宜聚散，国际之宜钩拒，必正人心，而后损益之道得已。钦惟皇帝陛下以天纵之资，有日新之德，当协和万邦之时，勤清问下民之念，固已酌古准今，遏恶扬善，治咸五而登三矣。乃圣怀冲挹，弥切畴咨，举设官、明刑、理财、交涉诸大端，进臣等于廷而策之。臣愚，何足以承大对？然臣尝深惟方今立国之势，泥师古之训，或捍格而难通；务权宜之说，亦泯棼而为患。兹当对扬伊始，敢不就素所知者，以尽献纳之忱乎？

伏读制策有曰：设官分职，为《周官》致治之本原，因

详考历代官制得失。臣按：周制，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皆以论道佐君，其任至重。然曰：官不必备，惟其人。是虚其位，以待贤者。至汉制有上公，又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三公。若王莽之充三公，是乃官非其人，而非官制之失。自汉明帝以后，三公始不预事。魏、晋以来，中书、尚书之官，贵为宰相，而三公遂为具员。至唐，更立三师，位三公上，则徒为优异之文而已。后世建设既繁，备员孔多，于古六官之外，复立卿名。然汉制未分六曹，则卿位之九，犹可言也。后世既有六部，又有九卿，其弊以宋为甚。若太常寺之宜裁并于礼部，大理寺之宜裁并于刑部，凡官之相类者，皆可省也。三代虽无谏官，而庶民皆得进言。汉惩秦祸，始立谏官。元狩五年，置谏议大夫，遂有常员。谏官以位卑而无患得患失之念，弹劾不避权贵，此用人之微意，王安石之论非也。翰林学士，皆掌文诰。唐时重文学之士，礼遇诚至，颇合乎古。藩镇之弊唐，殆犹封建之弊周。李纲感宋祸而思藩镇，亦有以也。要之，官制沿革，不能悉数。愤时之士主裁并，而贪位者则欲崇体制。不知后世固患冗官之多，而尤患治事之官太少。裁官之见，虽切于时弊，未尽治理也。皇上整饬官常，汰冗官，增要职，用人循名责实，孰敢不自励哉！

制策又以明刑弼教为经世大政，因古典而旁求西律，诚求治之苦心也。臣按：古人云：读书不读律，不能致君尧舜。古之圣王，以刑佐礼，因天秩制五礼，因天讨作五刑，故明刑必原礼法。《周官》：大司寇所掌，有轻典、中典、重典；其用之也，审乎新国、平国、乱国之宜。后世刑律愈密，而用典之法则疏。董仲舒深于《春秋》，以之决狱，通经致用，士之极致也。汉章帝承永平故事，政尚严切；而陈宠上疏，以

为奸慝既平，必宜济之以宽。献帝时，应劭删定律令，而当时纲纪日乱，刑罚不中。儒生之论，虽本忠厚，往往不切事理。唐高宗时，言者以为死生罔由法律，轻重必因爱憎，请更定科条，深中时弊。夫虞廷命官，以皋陶作士，其学至精，而意至密也。非深思之士，不能探索。然申、商之综核名实，而流于惨刻寡恩者，必非圣人所与。司马光谓士果知道，自与法合，信为知言。泰西政治家分政治学为国法学、国际法两支。国法学复分两种，宪法学为其一；而国际法为国与国之关系。今者，东西各国交通，刑律易致龃龉。至所谓国际法，尤视强弱为衡。泥古不变，则吾民多受屈抑，西律不可不谙也。皇上考古制，设律学，群臣能通中西律，则治民交邻无不宜矣。

制策又以生财之道，《大学》所称，而欲求富强之本。臣按：食货为生民之本，古有理财之学，故《洪范》列食货，而大《易》言理财。孔子欲富卫，而子贡善货殖，虽谋身与谋国不同，其为有学一也。《周官》：宰夫所掌，岁终正岁会，月终正月要，旬终正日成。旬月之间，必有会计。而岁终之钩考赋入赋出大较，其必以法均节财用。可知《王制》所言，固自一理，而互有详略。泰西预算、决算之法，颇合《周官》、《王制》之意。礼失而求诸野，不亦可乎？至若汉之桑、孔，言利析秋毫，然朘削于民，以供夫世主黩武之费，宜其损下而不能益上也。唐之刘晏、杨炎，皆计臣之著者。昔人谓刘晏知取予，其才要有足称，然皆多方以取民，而不能为民兴利。民财有尽，国用无穷，民竭而国亦匮矣。宋乾德间，始置三司使。其未置以前，天下财赋，长吏得擅支收之柄，而占留之弊，隐为侵蚀，此犹后世之有外销款目也。至太宗，改三司为总计。未几，仍复三部。其时国用殷

实，然未始非开国节俭之效也。泰西以商立国，其兵即所以保其商，故多取于商而不怨者，制用即在彼也。今不务生财，徒袭节用之说，曷足争衡泰西乎？皇上廑念富民，设商务官，订立商约，则外人不能专利于华矣。

制策又以两国交涉，而因欲振举财政，维系邦交，诚方今之急务也。臣按：公法主乎强权，使臣亦惟视国。欧美列邦，其地丑德齐者，则莫敢先动，而以公法、使臣为和好之端。至夫强弱不敌，则彼将肆其凭陵，而屏诸公法之外。至所遣使，并皆阴贼险狠；谙其法者，则以力欺之，不谙其法，则以智愚之。今之邦交，有足为寒心者矣！至于税则，本可听主国随时加增，而误载之约章，彼即得所借口，今者多悟其失，而挽回已难。商律固其保护政策，然必设立商部，以掌商之教治禁令，而后商律得有所属。又必广设商务学堂，而后讲明商律者多。顾诸端均非要图，而必以强权为首先。至工业宜重制造，商业则开矿产，人所共知，无烦悉数也。

皇上宵旰忧劳，孜孜焉图富强，求治綦切矣！臣之所陈，尤伏愿陛下思所以去成见而正人心者，则必广兴学校，宏奖人材。博学以充其识，则成见自除；绩学以端其志，则人心自正。由是人知毁家纾难之谊，士有折冲御侮之才，而庶司自无冗滥，听讼自能得情，制用自无中饱，邦交自能强权，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清明节后叙乡情

——缅怀徐谦，兼忆徐鼐

鲍弘道

从歙县北门外，经过万年桥，沿着歙许公路前行四公里，就来到中国近代名人、已故国民党元老徐谦的故乡徐村。这里环境幽美，村前是发源箬岭、昼夜奔流不息的富资水，村后是阡陌纵横、土质肥沃的大片良田。在天气晴朗的日子，站在村边，便可远远望见白云缭绕的黄山云门峰。村中现有居民四百数十人，大都务农为业。近年来，农村实行经济改革，这里绝大多数农户也都增加了经济收入，生活一年比一年有所改善。

徐村过去是徐氏聚族而居之地，千百年来，徐谦的祖上就世居于此。这里有他家的祠堂、故居和族人。民国二十六年出版的《歙县志》，在《选举·科目》第六十三页上记载着：徐谦于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公元一九〇二年）乡试，中举人；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公元一九〇三年）殿试，中进士。他与经学大师歙人吴承仕是同年同科考中举人的。县志在他的名字下注云：“徐谦，字季龙，徐村人，癸卯进士，编修，京师地方检察厅长。”听说在他中进士、点翰林时，他故乡的祠堂里还为他挂起钦赐的匾额，可惜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祠堂里的许多匾额都荡然无存了。

徐谦出生于客地江西省南昌，成年之后，为了工作需要，